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研究

论个人档案与当代中国史研究领域的新拓展

戴建兵 张志永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摘要]历史是人的活动史,社会的真正进步必然体现在社会普通大众身上,而研究他们的个人生活史是发现和认识社会变迁的重要渠道之一。目前,社会上游离着大量的个人档案,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档案属于官方文献范畴,类型较齐全、内容较系统、真实度较高,是研究当代中国个人生活史的极为重要的原始资料。遗憾的是许多人尚未发现其潜藏的学术价值,以致不得其用。学术界应该尽快重视和挖掘这些个人档案,并进行学术研究,如此既有助于开辟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新领域,又能深化对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认识。同时,重视搜集、甄别、分析和使用个人档案,并将其与其他资料相印证,可以更为客观地还原和再现历史本来面目。

[关键词]个人档案;当代中国史;新史料;个人生活史

[基金项目]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中国婚姻史研究”(15ZDB050)

[作者简介]戴建兵(1963—),男,河北唐山人,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张志永(1964—),男,河北新乐人,河北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20)03-0001-10 [收稿日期]2019-10-2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界日臻活跃,高质量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其动因之一就是诸多新的研究史料被大量发现和挖掘出来。就当代中国史研究领域而言,诸如档案、口述史乃至民间文书等多种类型新史料的挖掘、使用和解读,极大地拓展了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然而,当代中国史研究的相关史料多不胜收,仍然有许多重要的史料尚未挖掘出来,个人档案就是其中一例。本文试图从个人档案的类型、内容及其与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关系等方面进行分析,抛砖引玉,求教方家。

一、个人档案的由来及类型

个人档案,是中国民间社会对人事档案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称呼。究其因,就在于人事档案是“人事、组织、劳动工资等部门在对人员的考核管理活动中形成的档案”,它“记述和反映个人经历和德才表现,以个人为单位整理、集中保存”。人事档案包括

干部档案、职工档案和学生档案三种,其“内容记录干部、职工、学生个人的自然情况、社会经历、思想品德、业务能力、专业水平、历史和现实的表现”^{[1] P157}。人事档案一般具有现实性、动态性的特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所记载的内容会不断充实和丰富,其时间跨度往往伴随着档案主人的一生,故在日常口语中通常也被称为“个人档案”。

新中国人事档案制度源自中国共产党的政审制度,中国对人事档案的建立和管理工作都比较严格、规范。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后就特别重视干部档案管理工作,把收集和保管干部档案作为干部工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以便更好地管理、考察和使用干部。尽管在1949年之前曾长期处于地下斗争和战争环境之中,各方面条件都较为恶劣,但中共仍然克服了重重困难,使干部档案和干部档案管理工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初步建立起来。至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抗战局势相对稳定,中共党组织遂开

始大规模地建立干部档案。早在1940年8月,八路军一二九师已经建立了营以上干部档案。其后,各旅各分区于1941年1月也建立了连以上干部档案。这“是组织工作中新的发扬与创造,也就是对于干部作全面的有系统了解的更好办法”^{[2] P325}。此后,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进军和斗争环境及条件的改善,干部档案工作更加发展和完善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关党和国家的档案工作迅速发展为国家档案事业。1954年11月,国家档案局成立后,各省、市相应地建立和健全了各级档案工作组织机构,中国档案事业步入有计划、有组织的发展时期。其中,干部档案成为人事档案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全国自上而下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每个人都要加入一个“单位”,乃至后来被戏称为“单位人”,这就为普遍地建立健全人事档案制度提供了条件。一般而言,每个单位都以反映个人情况的材料为一宗,并以个人姓名名称标明档案卷名,进行整理立卷,这就是人事档案。

具体而言,干部档案是“干部个人经历和社会实践的记录,是干部思想品德、业务能力和工作情况的反映,是历史地、全面地考察了解和正确选拔使用干部的一个重要依据。它是党组织按照党管干部的原则和党的干部政策,根据培养、选拔和正确使用干部的需要,将干部的有关材料集中整理而成的”^{[3] P32}。当代中国干部档案管理工作比较严格,既规定了集中统一和分级负责的原则,亦在管理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保卫、保密制度,严密保管,以保证干部档案的绝对安全。

职工档案通常指企业员工档案,它“是企业劳动、组织、人事等部门在招用、调配、培训、考核、奖惩、选拔和任用等工作中形成的有关职工个人经历、政治思想、业务技术水平、工作表现以及工作变动等情况的文件材料,是历史地、全面地考察职工的依据,是国家档案的组成部分”。职工档案通常由所在企业的劳动(组织人事)职能机构管理,并接受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和指导,必须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档案、保密的法规与制度^{[4] P78-79}。

学生档案是集中保存起来的个人在求学期间所形成的各种材料,是人事档案工作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开初性,即大多数人事档案均起始于学生时期,这些材料反映了

人事档案中最初阶段的内容,对了解一个人的全部历史和全部表现具有重要价值;二是阶段性,通常而言,人的一生大体可分为求学和工作(包括退休期)两大阶段,而求学阶段必然向工作阶段过渡,故学生档案只是反映了一个人在求学阶段的情况,它是后来的工人档案或干部档案的前身;三是单一性,即学生的经历一般较简单,所形成的档案材料数量较少,内容较单纯,大多是反映学生在校期间的学历、学习成绩、品德操行等方面的情况^{[5] P156}。

人事档案是各级组织与单位考察、了解和正确使用人员的基本依据,甚至被赋予了无形的行政权力,诸如入党、提干、奖惩、晋级、离退休等人生大事都离不开人事档案。它由各单位的人事、组织部门集中统一保管,带有机密性特点,这无形中为人事档案增加了些许神秘色彩。国家、单位对人事档案的管理非常严格,其中规定任何个人不得查阅或借用本人及亲属(包括父母、配偶、子女及兄弟姐妹等)的档案。例如,中共中央组织部明确规定,“干部档案是党的机密”;“干部不得查阅或借用本人及其亲属的档案”^{[3] P32}。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俗称的“干部”,不是专指具有官职头衔的人,而是指在党和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或军队中担任公职或从事公务活动的人员,其数量远比具有官职头衔的人数要庞大的多。后来,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国家档案局共同规定,“任何个人不得查阅或借用本人及其直系亲属的档案”^{[6] P1161}。这就意味着不仅干部档案任何个人不得查阅,而且职工档案、学生档案等也不准个人查阅。除因工作需要之外,只有组织部门有权查阅人事档案。因此,虽然人事档案记载了大量的个人信息,但长期以来无法纳入学术研究领域。

除了人事档案以外,其他类型档案中也存有許多记载个人生平、事迹等内容的档案,如爱国人士档案、反革命档案等,以及人民公社档案、司法行政档案、工商联档案等。现简要介绍如下:

1. 爱国人士档案:1949年9月,全国政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纲领》,其中规定“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权。”由此可见,当时的爱国民主分子特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大阶级以外的人员,其绝对数量显然有限。其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不断扩大爱国人士

的范围。2018年新修订的《宪法》指出,中国“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显然,新时代爱国人士包含的对象极为广泛,除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以外,其他海内外符合以上三项标准的所有阶层、团体和个人都被称为爱国者。虽然所有爱国人士未必都建立了个人档案,但鉴于其基数非常庞大,建立个人档案者应该为数不少。这些“爱国人士的档案由各级党委统战部按党委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进行管理”^[3]^[P73]。其中,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中著名人士档案无疑是爱国人士档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2.公安业务档案:它是“公安机关各业务部门,为同间谍、特务、反革命、刑事犯罪、重大嫌疑分子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人进行斗争,对一个案件、一个人、一个组织(团伙或集团)、一起重大事件进行侦察(侦查)、调查、审理或对违法人员进行拘留、逮捕、审讯、执行劳动教育改造、治安处罚等项工作中形成的文件材料(包括影片、照片、录音带、录像、图纸等),都属于公安业务文件材料”^[7]^[P745—746]。1982年又规定,“凡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刑罚,交付监狱、劳改队、少年犯管教所执行的罪犯,都要建立单人档案”^[8]^[P395]。公安业务档案范围广泛,大到国外敌对势力,小到国内违反社会治安者,从犯罪集团、组织到犯罪个体,把各种各类被抓获的作奸犯科者都包揽在内。“罪犯、劳教人员档案是监狱、劳教所执行刑罚和执行劳动教养的法律文书,是罪犯在监管改造期间和劳教人员在劳动教养期间形成的考核、奖惩、年终鉴定、出监(所)鉴定等具有保存价值的执法文书。”^[9]^[P301]

3.司法行政档案:司法档案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和司法行政工作的历史记录,它是“在司法行政工作中形成的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司法行政档案分为文书档案,专业档案(劳改罪犯和劳教人员档案、公证档案、律师业务档案、乡镇法律服务业务档案;财会档案、科

技档案、教学档案、新闻书稿档案、基建档案等)和声像档案”^[10]^[P496—497]。至1960年7月,全国大多数地方的人民法院先后在当地档案管理机构指导下逐步改善和完善了档案管理工作,并建立了必要的档案管理制度,其中保存和收藏了众多涉及个人的档案。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泛称“个人档案”与人们日常口语中专指人事档案的“个人档案”二者间有些微差别。具体而言,本文中的个人档案分为两大类:一类指失去管理效力的人事档案,它们直接来源于干部档案、职工档案和学生档案,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个人档案”。另一类指在失去管理效力的其他类型档案中涉及反映个人情况的各种档案。它又分为两种:一是诸如爱国人士档案等比较系统的个人档案,如杜高档案^①;二是记载个人某段历史或某件重大事项的档案,如司法行政档案中的劳教、罪犯档案等。笔者曾查阅过1958年陕西省城固县一套反革命案卷宗,包括提请逮捕审批书、审查登记表、批准逮捕决定书、起诉书、判决书、刑事判决书等,共计15页^②。这份档案较为完整地记载了该犯从立案到审判完结的整个过程,这无疑是其个人生活史中极为重大的事件,虽然它仅反映了其人生的一个阶段经历,但它很可能影响了其以后的生活、工作轨迹,故这些档案理应视为个人档案。

按照相关规定及原则,无论是人事档案还是其他类别档案均有一定的保管期限;一旦保管期限已满或档案已经失去其保管价值后,必须经单位主管档案工作的领导批准,都要予以销毁。如职工死亡后,其档案由原管理部门保存五年后,移交企业综合档案部门保存;对国家和企业有特殊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死亡以后,其档案由企业综合档案部门按规定向有关档案馆移交;按规定需要销毁档案材料时,经过主管档案工作部门的批准予以销毁。然而,囿于种种原因,许多企业并未严格照章执行职工档案管理的各项规定,以至于许多档案流失出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急剧地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原先众多的国营企业、集体企业等纷纷转制,或关停并转,职工下岗分流,“单位人”成为自由的社会人,诸多人事档案随之丧失了原先的管理作用,往往流散在民间。甚至由于有的

①参见李辉《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

②参见笔者收藏1958年陕西城固反革命案卷宗全套照片。

单位对档案工作不够重视、管理不善等原因,发生了大批案卷丢失的严重情况。如1960年代初,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全区各基层人民法院自建院以来所保管的司法档案进行了检查清理,发现都有丢失档案的情况,有的几十件,有的几百件,锦西县人民法院就丢失了700件。全区共丢失刑、民事档案2122件,已找回369件,尚缺1753件,占归档总数的1.9%”^{[11] P2279}。这些档案流失到社会上后,无形中就成为当代中国史研究所关注的重要资料。

就笔者所接触到个人档案而言,发现这些档案具有“多、散、低、乱”等特点。所谓“多”是指个人档案数量庞大,虽然就某个单位而言,流失出的人事档案数量有限,从数份到几十份都有,然推及全国,几乎原国营和集体企业都存在着档案流失情况,故流失个人档案总数颇为惊人,难以计数。所谓“散”是指个人档案的分布面很分散,仅笔者统计所收集到的个人档案,即覆盖中国大陆各个省、市、自治区,至于在网站上见到的个人档案更是全国各地所在都有。所谓“低”是指档案主人的行政级别低,鉴于当代中国干部档案管理制度非常严密,即便过了保管期限,也难于流失到社会上来;相对而言,企业职工档案、司法行政档案等管理工作要松散许多,故社会上可看到的档案绝大部分是普通职工档案,能够找到科级以上干部档案或知名人士的个人档案情况极少。所谓“乱”是指这些档案内容比较杂乱,囿于各单位对人事档案工作重视程度不一,导致个人档案内材料详略差别很大,有的个人档案多至数百页,比较详尽;有的个人档案仅寥寥十几页甚至数页,极为简略,难以反映档案主人的生活、工作历程。

迄今,学术界很少有人重视收集和整理个人档案,更未听闻有哪个国家档案机构或图书馆有计划地收购和保管个人档案,仅有少数感兴趣的个人研究者或少数研究机构收藏个人档案。例如,河北省邯郸学院太行山文书研究中心收藏了大批民间文献资料,由于绝大部分资料来源地是以太行山区为中心,集中于晋、冀、豫交界地的涉县、武安、昔阳、平顺、邢台县等数市县,故名之“太行山文书”。太行山文书中记载时间上溯明中叶,下至1980年代人民公社结束,大致分为个体文书、宗族文书、村落档案、民间教育文书、日用类书等五个类别以及部分单位文书。其中,个体文书包括传记、年谱、档案、书信、照片、笔记、日记、作文等;家族文书包括契约、账单、族

谱、家史、礼仪文书、科仪文书等^{[12] P65}。这样做,可有效保护部分个人档案。不过,这个研究中心并非专门收藏和保管个人档案,而且选择的藏品有一定地域限制,故其所收藏的个人档案数量有限。至于就个人爱好者收藏而言,很少有雄厚的财力作支撑,故收藏情况不容乐观。与流散到社会上数量庞大的个人档案相比,能够被收藏和保护起来的个人档案为数极少,仍有大量的个人档案无法收集、整理和保管,甚至被送到造纸厂化为纸浆,殊为可惜。因此,笔者希望有更多的人重视和收集个人档案,一是保管历史资料,二是加以整理、研究,假以时日,也许会开辟出一门“当代中国个人档案学”的新研究领域。

二、个人档案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概而言之,人事档案基本内容是“三龄二历一身份”,即年龄、工龄、党龄、学历、经历和身份,这六个要素提纲挈领地涵盖了一个人的生命历程。而个人档案中所有材料也都是围绕这六个要素展开的。

早在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曾规定了干部档案的内容,“包括入党志愿表、履历表、鉴定表等”^{[2] P323}。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军区详细规定了整理干部档案的内容,包括简历、社会关系、历史重大事件、军龄党龄、鉴定、备考等,如“整风自传、鉴定书、反省材料、各种登记表、历史报告各方面的证明信件、申请书、入党志愿表等。……整理好的干部成文档案,一般情况如可能时应给本人阅看,征求其本人意见,以求得主客观一致,但有政治问题或未作结论的例外”;并不厌其烦地说明如何填写,“简历一般应包括姓名、家庭成分、本人出身、文化程度、已否结婚、革命前后的主要经历及其思想演变”;“所谓重大事件一方面是指关于牵涉到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的重大原则问题。如来历不清参加过其他党派社团、被捕、被俘、脱离组织、自首叛变、严重的思想错误或违犯纪律等行为。另一方面是指在各种斗争中表现特殊坚定顽强为党建立特殊功勋等重大事件”;备考中注明干部“身体强弱疾病残废情形”、“有什么专门技能与特长”、“可以适合做那些工作”,以便党组织掌握和使用等^{[2] P325—328}。不过,这个时期干部档案工作处于普遍建立阶段,因而干部档案内容主要是补录性质,还未形成动态化随时建立。

新中国成立后,“加强干部档案工作,搞好干部档案建设,是做好干部工作的必要条件”^{[3] P26}。特

别是1956年第一次全国干部档案工作座谈会召开后,各级党委加强了对干部档案工作的领导,比较系统地建立和整理干部档案。干部档案分正本和副本两套,“干部档案正本由历史地、全面地反映干部情况的材料构成”,副本由概括地反映干部历史和现实情况的材料构成。正本档案内容分为九类:第一类履历材料,第二类自传材料,第三类鉴定、考核、考察材料,第四类学历和评聘专业技术职务材料(包括学历、学位、学绩、培训结业成绩表和评聘专业技术职务、考绩、审批材料等),第五类政治历史情况的审查材料(包括甄别、复查材料和依据材料,党籍、参加工作时间等问题的审查材料等),第六类参加中国共产党、共青团或民主党派的材料,第七类奖励材料(包括科学技术和业务奖励、英雄模范先进事迹等),第八类处分材料(包括甄别、复查材料,免于处分的处理意见等),第九类录用、任免、聘用、转业、工资、待遇、出国、退(离)休、退职材料及各种代表会代表登记表等材料,第十类其他可供组织上参考的材料^{[6][P1160]}。

其中,干部履历表记载了其个人学习、工作等主要经历,是档案中最重要的材料。中共中央组织部不仅统一规定了《干部履历表》的式样,还明确地介绍了填写说明,诸如“姓名”中的“曾用名”,应按使用先后顺序填写,用字要固定,可使用简化字,但不可用同音字代替。“家庭出身”,系指本人取得独立经济地位前或参加革命工作时的家庭阶级成分,以了解干部生长的家庭是什么阶级成分;经组织审查,家庭出身作了改变结论的,即按改变后的情况填写;未经组织确定改变者,个人均不得自行改变。“本人成分”,系指本人参加革命工作或担任国家干部前的社会地位,以了解干部来自什么社会成分;在参加革命工作或担任干部前本人社会职业变动较多者,一般应以紧靠参加革命工作或担任国家干部时的情况填写。“现有文化程度”,主要按干部的学历或现有的语文程度或技术专业水平填写;按学历填写的,应写明毕业或肄业,如“小学毕业”、“中专毕业”、“大学一年”,按现有语文程度或技术专业水平填写的,应加上“相当”二字,如“相当初中”、“相当高中”、“相当中专”等。“工资级别”,应写明何种工资标准和级别,如“行政十级”、“技术五级”、“卫生三级”等;未评定工资级别或级别与工资不符的,应写明每月实际工资数。“原籍”,系指干部祖居地,按现行政区划

详细填写,由省(市、自治区)填写到村(街道、胡同和里、弄、巷等);如果干部祖居地与出生地址不一致时,“原籍”一般按其父亲的籍贯填写,“出生地址”按本人出生地址填写。“身体健康状况”,应分别填写“健康”、“一般”、“较弱”,有慢性病或身体病残者,应加以具体说明。“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入团、入党,何时转正”,应按要求逐项填写清楚,抗日战争以前参加共青团后又转党的,应写明入团时间和转党时间;脱过党或失掉过组织关系的,应以组织所确定的时间填写。“何时何地参加革命工作”,应按照中共中央组织部1980年3月15日《关于确定干部参加革命工作时间问题的暂行规定(草案)》的精神填写,凡改变过去填写的“参加工作时间”者,均需按干部管理权限,经组织批准后方可改动,个人均不得自行改变。“何时何地何原因受过何种奖励或处分”,包括党内外奖励或处分,处分已经撤销者,应注明何时何部门决定撤销;凡冤、假、错案经过甄别平反或改正后,应在“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栏内扼要填写何时何部门甄别平反或改正的结论意见。“有何特长和专业技术,熟练程度如何,有何著作和发明创造”,应如实填写。专业学校毕业的,应写明学何种专业及其实际水平;虽未进过专业学校,但在工作中掌握了一定的专业技术,或长期从事某项专门业务工作,已具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也应将熟悉程度写清楚。“家庭主要成员”,系指本人的直系亲属(父母、爱人、子女)和长期在一起生活的、受其抚养或由本人供养的其他亲属,其中如有被人民政府镇压、判刑和管制的应加以注明。“国内外主要社会关系”,系指与本人来往较多、关系密切的亲属、亲友、同学、同事等,其中如有被人民政府镇压、判刑、管制的,应加以注明;对于每一社会关系,均应按本项具体内容填写清楚。“参加革命前后履历”,一般从7岁或开始上小学时填起,“起止年月”前后时间要衔接,“地区和部门”应填写全称,“职务”应写明具体职务,如有兼职者同时填写所兼职务,兼职较多者可填写主要职务。“证明人”,在参加革命工作前,应填写最熟悉本人情况的人,参加革命工作后,应填写当时的直接领导人或在一起工作的同级人员。离职学习、劳动、下放基层工作等连续半年以上者,均应作为履历填写。另外,还特别提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履历应按实际情况填写;凡有工作职务的,可填写在何单位任何职务,无工作职务的,可填写“文化大革命”、

“五·七干校劳动”、“受审查”、“受迫害”等^{[3] P85-87}。

同期,中共中央统战部制定了爱国人士档案管理办法,而且规定爱国人士的档案分为正本和副本两套。其中,正本档案内容包括:1.履历表、简历表;2.自传或小传;3.干部鉴定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名表;4.个人思想、工作、学习的总结、心得或检查等材料;5.政治历史问题的审查、复查材料(包括审查结论、复查结论、本人写的交代、申诉以及有关的检举、旁证材料等);6.申请加入民主党派或中国共产党的材料;7.正规的理论、文化、技术学习成绩表等材料;8.干部任免呈报表、出国人员审查表、工资级别登记表、晋升技术职称、学位、学衔审批表及业务技术方面的考核材料;9.其他可供组织上参考的材料^{[3] P73}。

企业职工档案,虽无正本和副本之分,但档案内容同样严密细致,要求档案卷皮、目录和档案袋的样式、规格必须统一。所在企业的劳动(组织人事)职能机构对职工进行考察、考核、培训、奖惩等所形成的材料要及时收集、整理立卷,保持档案的完整。企业职工档案内容为:1.履历材料;2.自传材料;3.鉴定、考核、考察材料;4.评定岗位技能和学历材料(包括学历、学位、学绩、培训结业成绩表和评定技能的考绩、审批等材料等);5.政审材料;6.参加中国共产党、共青团或民主党派的材料;7.奖励材料;8.处分材料;9.招用、劳动合同、调动、聘用、复员退伍、转业、工资、保险福利待遇、出国、退休、退职等材料;10.其他可供组织参考的材料^{[4] P80}。

劳改罪犯档案,分为正卷和副卷。正卷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罪犯刑事判决书、执行通知书、结案登记表;2.罪犯入监登记表、健康检查表;3.罪犯的历史、自传材料和本人的重要反省材料;4.对罪犯改造表现的考核、奖惩材料,他人对该犯的重要检举揭发并经过查证属实的材料;5.罪犯逃跑、行凶、破坏事故情况及处理材料;6.对罪犯提出加、减刑的呈批材料;7.罪犯死亡、工伤情况材料和医疗鉴定结论等;8.罪犯刑满释放、假释、保外就医、监外执行的材料;9.法院的改判裁定书、加刑、减刑判决书、平反裁定书、特赦、宽大释放裁定书等;10.罪犯出监鉴定表^{[8] P395}。

尽管上述人员的身份、职业不同,但其个人档案的内容基本一致,均围绕“三龄二历一身份”收集整理。这些材料简明扼要,不仅比较清楚地勾勒出其学习、工作和生活的主要经历,还包含了其他方面的

诸多信息,间接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发展状况。

个人档案从内容上看,真实性比较强。毛泽东有句名言“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客观而言,在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干部工作作风普遍是认真、扎实的。这一点反映在档案工作中,就是档案材料的真实性普遍很高。干部档案依附于干部工作,其档案内容必须真实、可靠自不待言,即便职工档案立卷时,“立卷归档的材料必须认真鉴别,保证材料的真实、文字清楚、手续齐备。材料须经组织审查盖章或本人签字的,应在盖章、签字后归档”^{[4] P80}。如笔者翻阅个人档案时,在外调材料部分发现了一个细节,即档案中存有外调介绍信存根,必须两人进行外调,谈话笔录本人必须签名,回函必须盖外调单位公章等,这些材料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颇具可信度。

个人档案从覆盖时间上看,一般时间都比较长。人事档案一般都是从7岁或上小学开始填写,其后随着档案主人的学习、工作变化或参加各项社会运动,各种相关档案材料也连年增加,乃至在档案主人离、退休后,档案管理工作仍然延续,如历次增加工资或发放补贴等资料都继续收纳在内,直到档案主人离世,这份档案才算过了有效期。大致说来,个人档案相当于单位为个人编纂了一部史料长编,涉及范围极为广泛。

当然,除了人事档案覆盖时间段比较长以外,也有一些与个人相关的档案涉及时间比较短,但它往往说明了其人生中的某一项重大事件,材料也比较丰富和集中。例如,李辉收藏了1964年田汉的一组档案,集中反映了他改编《谢瑶环》一剧后自我检查和受批判的情况。这组材料目录如下:1.思想检查(1964年),1份,33页;2.我的检查(1964年),1份,33页;3.田汉同志的第二次检查(1964.7.25),1份,10页;4.田汉同志第四次检查(1964.8.20),1份,12页;5.田汉同志关于“谢瑶环”剧本的检查,2份,31页;6.我的检查,1份,34页;7.党组会议成员检查记录(1964.11.17),1份,14页;8.剧协检查工作会议记录(1964.7.15),4份,102页;9.剧协支部扩大会议记录(1964.8.17),3份,56页;10.田汉检查,1份,11页;11.对田汉同志检查提意见记录,2份,40页;12.党支部扩大会议记录,1份,21页;13.批判田汉会议的记录,1份,4页;14.会议记录本,3份,39页;15.田汉同志在剧协第

四次常务理事会议上的报告记录 5 份,78 页^①。粗略算来,在不足一年的时间内,相关材料数量多达 500 多页,比较详尽地反映了田汉改编《谢瑶环》的前因后果,批判者的发言以及田汉受到批判时的思想、认识变化,从中不仅有助于厘清“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田汉的心路历程,更能够帮助人们理解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文艺界“左”倾错误的发展和扩大化。

三、个人档案与当代中国史研究领域的拓展

王国维曾言,“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证之事实,此言委实不虚。个人档案作为新发现的史料,其对当代中国史研究必然有着非常深远的价值和巨大帮助,无疑将推动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新进展,并拓宽新的研究领域。

首先,从史料与史学关系的角度看,个人档案开辟了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新领域。历史研究是一个高度依赖证据作出结论的学科,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十分材料说十分话,没有材料就不要妄下断言。早在 1920 年代,傅斯年提出了史学研究的三条标准:第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地研究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第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第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退步”^{[14][P21,23]}。这充分说明了史料与史学的密切关系,毫不夸张地说,发掘新材料往往成为开辟史学研究新领域的关键。例如,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甲骨文发现后,出现了甲骨文学;敦煌卷子发现后,出现了敦煌学;顾颉刚发现和挖掘了民俗史料后,开辟了民俗学,等等。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史研究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随着口述史、田野调查等新研究史料的不断挖掘,很快就开辟了社会史、日常生活史等新的研究领域,乃至有学者认为,从“社会生活”转向“日常生活”是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要特色,提出了“中国乡村日常生活史”研究新方向^②。

个人档案无疑是最新发掘出来的弥足珍贵的史

料,可谓“历史地、全面地了解一个人的必要手段……是确定和澄清个人有关问题以及进行正常的政治审查的凭证”;尤其是个人履历表和简历,可以看作是一个人的大事年表,顺藤摸瓜,很容易还原其人生历程,“是研究和撰写各类历史、传记的珍贵资料”,能够丰富和推进既有研究领域。同时,“人事档案可为人事政策、工资政策、人才学、管理学、心理学等研究工作提供资料”^{[5][P154]}。以此为基本研究资料,必然能够继续丰富和开辟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新领域。前几年,笔者已经提出了研究当代中国个人生活史新领域的问题,认为“历史不全是英雄将相等少数精英人物丰功伟业般的宏大叙事,更是升斗小民微不足道的生命历程的集合体”,提出以个人档案为基础,综合使用日记、回忆录和田野调查等各种相关资料,借鉴西方私人生活史等研究理念或方法,开辟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个人生活史研究新领域^③。虽然开辟一个学术研究的新领域颇为不易,但如果有更多的学者加入进来,不断挖掘、研究新史料,假以时日,最终有可能会成功的。

并且,个人档案还可以修正和完善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已有观点及认识。譬如,人们在谈到改革开放前 30 年普罗大众的生活时,往往脑海里就浮现出物资短缺、生活困难等程式化镜像,对“三年困难时期”广州妇女在街头垃圾堆中捡拾菜叶的照片印象颇深,但几乎无人能够举出一个家庭长时段的生活实态来证明这个观点。笔者曾经利用一份个人档案,系统地研究了东北某县一个职工自 1930 年代至 1980 年代初的生活、工作情况,发现改革开放前工人阶级家庭生活水平的高低与其家庭参加工作者人数的多少呈正比例,全家日常经济生活水平大致呈现“高一低一高”U 型曲线状态,除了中年阶段因养老育幼等原因,易出现暂时性生活困难外,青年和老年阶段都生活在温饱线以上,并且在总体上呈缓慢提高趋势,尤其是年届退休,子女都参加了工作,这时全家生活愈过愈好,已经步入了小康甚至富裕的生活。故从中得出结论,改革开放前工人阶级生活既有富裕阶段又有困难阶段,并非像人们所想象的那

① 参见李辉《田汉手抄档案令人心痛》(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807/08/33994180_677236417.shtml)。

② 参见高思峰《问题与问题意识:近现代中国乡村日常生活史研究路径探讨》(《历史教学》2018 年 2 月下半月刊)。

③ 参见戴建兵、张志永《个人生活史:当代中国史研究的重要增长点》(《河北学刊》2015 年第 1 期)。

样一直困顿不堪^①。

其次,从精英与大众的关系看,通过个人档案可追寻当代中国社会主体的生活变迁。按照政治社会学的观点,任何社会都有精英与大众之分。所谓“精英”,意指“精选出来的少数”或“优秀人物”。精英理论认为“在任何形式的政治统治里,包括民主政治,都存在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对立,其中统治者虽然是少数,却垄断了政治权力,履行着所有重大的政治职能。而被统治阶级虽然是一个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但他们只是统治的对象而已。”^{[15] P198} 因此,只有从某个时期某个社会的精英群体入手,才能揭示彼时彼地的社会变迁本质及其规律。

然而,就群体人口数量而言,精英毕竟是少数,而社会主体是大众,社会上层精英可以引领时代风尚,但社会下层芸芸大众才是社会变革的真正主体。所以说,真正的社会变迁必须体现在社会大众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变迁上来,否则就会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孔子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这句话旨在说明,衡量历史进步和社会变革的基本标准,不是社会上层或精英阶层的生活方式,而是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梁启超亦言“我们以为:欲知历史真相,决不能单看台面上几个大人物、几桩大事件便算完结;最要的是看出全个社会的活动变化。”“史学对象的事实,你说单靠几位大英雄的战记、几位大学者的著述吗?这些固然可以表现社会的特殊力,却不能表示社会的一般力。”^{[16] P4047} 他从特殊性与一般性的区隔来说明少数社会上层精英人物的特殊性不能代表社会大众的一般性。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也都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与精英人物档案难以寻觅相比,普通职工的个人档案则比比皆是,这恰好给我们提供了研究社会主体变迁的最好史料。有学者提出,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②。其实,笔者认为这还不够,应该是从社会下层看历史。党和国家的政策、法规固然是引领及改造社会的基本指南,但社会普罗大众并不一定全盘接受,政策、法规等的落实是一个颇为复杂的过程,社会大众基于个人的观念、利益甚至情感,对上层政策、指示有全盘接受、有选择接受、有改造接受,甚至还有抵抗。比如在改革开放前,斗私批修、狠斗

“私”字一闪念等革命口号高唱入云,几乎深入到社会的角角落落和每个人的思想深处,但各单位几乎都出现过“大家拿”的现象,也就是半公开地“拿”国家、集体公物,乃至成了不成文的惯例。这看似悖论,其实却是社会大众在短缺经济、物资匮乏时代的自发反应,也是对公有制的误解所导致的后果。

再者,从小历史与大历史的关系看,借助个人档案可把握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按照西方政治学观点,国家与社会是一对辩证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学者非常热衷于采用国家、社会两分法研究中国历史,关注国家主导社会、社会制约国家的辩证关系。然而,中国具有悠久的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家国情怀,与西方国家、社会两分法格格不入。更何况国家主导社会变革也不是简单地按照“政策—效果”模式,中央和政府一声令下,民众群起响应,就像大机器生产那样,一头放进原材料另一头就生产出计划好的产品那样简单;而且社会参与政治也不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议会政治或游行、示威等方式。因此,照搬照用西方研究方法,难免犯削足适履的错误,难以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

如果我们按照中国政治文化传统,采取个体、家庭和国家三位一体的研究方法,就有助于正确地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历史研究的最本源、最核心的内容,有助于拨开一切浮在表面的混沌现象,直接揭示出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具体而言,我们要在国家大历史的背景下,以原始的个人档案为基本史料,仔细爬梳各种资料,分析和研究一个个具体的个人生活史的特殊性,然后对他们进行归纳总结,把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体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从个人小历史升华到国家大历史,就比较易于把握中国社会变迁的脉络。比如,传统婚姻制度(如“六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择偶观等)是建立在理想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理想婚姻制度,但因当时生活大多处于贫困状态,理想小农经济很难实现,所以理想的传统婚姻制度在不理想的社会现实中自然发生了很大扭曲或变形,乃至滋生重重弊端,“六礼”变成了买卖,父母之命蜕变为父母包办,媒人为了得到钱财

①参见张志永、戴建兵《政治情感与生活压力的冲突与调试——改革开放前一名普通职工的工作与生活》(《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

②参见刘志琴《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读书》1998年第2期)。

也两头欺骗等。这样就厘清了传统婚姻制度的历史脉络,也就比较容易地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婚姻制度的变革^①。

最后,从平面与立体的关系看,通过个人档案可多方位窥视社会变化。马克思指出“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才取得的。”^{[17] (P450)}人类社会不仅是一个纵向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横向的立体社会;当代中国历史可谓是立体的、复杂的、多元的综合体,既有纵向的进步,又有垂直的变化,不仅有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等重大历史事件和上层精英的宏大历史叙事,还有芸芸众生的凡人琐事、风俗习惯和喜怒哀乐等方面的分析与研究。从个人档案中,不仅看到诸多大历史的变迁,还可以窥视个体在历史大潮中的飘荡或浮沉。

笔者曾见过一套1963年湖南省常德县何某某(女)、崔某某(男)离婚案档案,共有23页,包括目录、湖南省常德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通知、湖南省常德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案件处理审批表、常德县西洞庭人民法庭呈批表、常德县人民法院通知、西农2分场4队介绍信、西农2分场4队谈话笔录(男方)、补充材料(男方)、接待笔录(女方)、调查笔录4份、西洞庭法庭民事判决书、常德县人民法院送达回证等。该档案完整地反映了“三年困难时期”一件包办婚姻从结婚到离婚的全过程。何某某是农村妇女,生产队积极分子;男方崔某某是农场工人,媒人介绍对象时欺骗女方,说男方是党员、农场事务长,工资收入高,并隐瞒了男方真实年龄;双方结婚前仅见了一面,也没有说话,女方就在家长的逼迫下嫁给了男方。结婚后,真相大白,男方不仅不是干部,而且家庭经济条件很差,连结婚用的蚊帐都是借来的,所以女方坚决要求离婚^②。这份离婚档案极为普通,却包含了大量的历史信息。一是形象而具体地反映了当时新婚姻制度刚建立后的进步与不成熟状态,前者如女方懂得运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离婚权利;后者如人们离婚必须从村里开具介绍信等。现在很多人不理解,误以为这是村干部限制妇女离婚的工具,其实这完全是后天的主观臆想。那时婚姻登记制度尚未普及,法院又不认识离婚当事人,如何判

定他们是夫妻而作出审判呢?所以,这时由村里开具离婚介绍信就尤为必要。二是从离婚诉讼中可以了解婚姻制度的变迁状况,如当时婚姻自由原则是否真正地完全得到贯彻执行?从这件离婚案中可以发现,实际上在表面上的婚姻自由背后,仍然残留着浓厚的包办婚姻、女方攀高门心理、男方故意欺骗等陋俗。三是从当时法院审判案件的方式可以了解当代中国法制史,如法院不是坐等双方在法院控辩,而是开展实地调查,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多方面听取群众意见,搜集人证、物证,了解双方婚姻是否真正破裂等,从而查明案情,正确地排忧解难,既坚决执行国家法律、法令和政策,又照顾当地群众的生活习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颇具“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特点。另外,从案件中关于工资收入的说明以及价值甚微的物质财产的诉讼中,也间接地反映出“三年困难时期”人民群众生活困难的实际状况,完全可以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四、结 论

当代中国历史是一部活在当下的正在持续发展着的历史,获益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其距今时间不远等因素,研究者可以获得“海量”的各类研究资料,似乎任何问题都不乏找到相关史料作依据。这就要求研究者在研究某一课题时,一定要注意选择和辨别史料,尽可能使用最合适、最权威的论据,以便得出客观、真实的结论。因此,我们要真正全面、客观地评价当代中国70余年的发展历程,正确地认识社会变迁的深度和广度,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乃至预见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就不能绕开庞大的社会主体即普罗大众;不仅注重研究党和国家的宏观政策、社会精英人物,更要重视研究社会大众的工作、生活及其喜怒哀乐,甚至包括不登大雅之堂的家长里短。现在,社会上游离着大量的个人档案,真实度高,且多数档案内容比较齐全,个人历史脉络比较清晰,是一种长时段地观察和再现芸芸大众工作与生活历史的原始资料,更是当代中国史研究中一块有待开掘的极为宝贵的历史资料富矿。因而,研究者尤应重视搜集、甄别、分析和使用个人档案,并将它与相关各类史料相互印证,最大限

^①参见张志永《婚姻制度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参见《常德离婚案卷宗》(http://www.997788.com/pr/detail_auction_637_18484722.html)。

度地还原或再现当代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

[参 考 文 献]

- [1] 吴宝康, 冯子直. 档案学词典 [Z].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4.
- [2] 中央档案馆. 中共文书档案工作文件选编 (1923—1949) [Z]. 北京: 档案出版社, 1991.
- [3] 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 干部档案工作文件选编 [Z]. 杭州: 内部出版, 1987.
- [4] 国家档案局档案馆(室)业务指导司. 机关档案工作必读文件 [Z]. 北京: 内部出版, 2010.
- [5] 陈鸿滨 等. 简明文秘工作手册 [Z].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87.
-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全书: 第 10 卷 [M].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1994.
- [7] 河北省公安厅三处. 公安派出所法规手册 [Z].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8.
-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行政规章汇编 (1949—1985) [Z]. 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88.
- [9] 监所管理实用法律手册 [Z]. 北京: 中央法制出版社, 2008.
-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分类汇编·行政法卷(1) [M].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0.
-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司法行政解释全书: 第 3 卷 [M].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1997.
- [12] 康香阁. 太行山文书研究开栏语 [J]. 邯郸学院学报, 2014 (3).
- [13] 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调配局. 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文件选编 (1939—1994) [Z]. 北京: 党建读物出版社, 1994.
- [14] 傅斯年自述 [M].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4.
- [15] 王威海. 政治社会学: 范畴、理论与基本面向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16] 梁启超全集: 第 7 册 [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On the new development of the research field of personal archives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DAI Jian-bing ZHANG Zhi-yong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 China)

Abstract: History is the history of human activities, and the real progress of society must be reflected in the general public. Studying their personal life histor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to recognize and discover social progress. At present,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personal archives in the upstream of society. These archives are more complete types, systematic contents and high authenticity. They are very important raw materials for restoring and reproducing the personal lif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a. Unfortunately, many people have not found their academic value yet. Academic circles should excavate these personal files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conduct academic research, so as to open up a new field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research, and deepen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 changes. Therefore, research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llection, screening, analysis and use of personal archives, and verify them with other materials, in order to objectively restore and reproduce the true face of history.

Key Words: Personal archives; Contemporary China; New historical data; The history of personal life

[责任编辑: 把增强]